

# 简论美国环保运动纪录片的风格与倾向

阎立峰 乔丹

新世纪以来,环境生态保护成为美国乃至西方纪录影片的热门题材之一,一些环保题材纪录片不仅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也成为各类评奖活动的赢家。如2006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制作的环境议题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又译为《令人难堪的真相》)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片奖;2010年的第8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又一部环保运动纪录片《海豚湾》获最佳纪录片奖。

本文拟选择三部获奖的美国环保议题纪录片《海豚湾》、《难以忽视的真相》、《燃烧未来:美国的煤矿》(2008年上映,获国际纪录片联合会大奖等)作为研究对象,借以探讨此类纪录片的功能、价值及风格技巧。

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纪录片在处理与自然及生态环境的关系时,一直有着两种理念或视野。其中之一是对大自然纯生态意义上的记录或建构,以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曲和英国广播公司(BBC)“野性世界”系列为代表,通过唯美的画面、精致的配乐以及节奏上的浪漫诗意来营造一个宁静祥和的优美之景,唤起人们对生态的关注、对自然的热爱(当然影像素材来自长期艰辛的跟拍)。这种类型的片子同时也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与追求商业性的美感以愉悦受众的创作意图相反,本文所涉及的三部纪录片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代表。这些以生态环保运动为主题的纪录片,把目光凝聚于处在运动中心的人,通过人的行为进行生态维度的书写,突出冲突性和故事性。如果说纯生态纪录片是“出世”的价值取向,那么环保运动议题纪录片是以“入世”的态度关照生态现实,并在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一定的话语空间和话语力量,塑造着观众的价值立场。

美国环保运动纪录片有明显的格里尔逊模式的烙印。在格里尔逊看来,电影是一个有能力塑造公众意见的严肃媒介,有力量去挖掘社会问题的根源及其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原因,所谓“艺术是一把锤子,而不是一面镜子。”环保运动议题纪录片承袭了格里尔逊的这一理念,纪录片工作者用影像承载社会实践活动,并将它当作是一把能够给现实以有力一击的“锤子”。

“锤子”的现代称谓是“议题设置”,这表现为,不管聚焦于何种领域的环保纪录片,终极目的都是向观影者传达生态正义之主题。以本文研究的三部纪录片为例,《海豚湾》涉及到海豚这种生物的生存权,作为一个符号,它又可以理解为环保运动者对于所有动物种类之动物权利的关注;《难以忽视的真相》关注的则是分配正义,即人类在满足自身发展的时候却剥夺了自然界的发展权利,也为人类自身的前途埋下隐患;《燃烧未来》借由回溯西弗吉尼亚山区居民反露天采矿运动的历程及心路,凸显西弗吉尼亚山区居民在地区开发问题的决策中无法表达合理诉求,不具有平等的参与权,片中质疑未经居民同意的开发决策本身就违反了程序正义。

## 二

环保议题纪录片在传达生态正义这一主题时,所使用的基本手段是在文本中构建正义与非正义立场的对立,通过二元冲突凸显善恶本性,达到揭示主题的目的。然而它的叙事模式毕竟不同于传统的主题先行的政论片,这具体表现为:

### 1. 宏大议题下个人情感的穿插

《难以忽视的真相》、《海豚湾》和《燃烧未来》三部环保类纪录片,内容都指向了公共议题等重大领域,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的疏离话题,再加上纪录片本身所探讨的问题往往充满悲情和抗争,创作中如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将整部片子变为“国仇家恨”的宣泄,进而让观众产生某些情感负担。

三部纪录片的主创者在扭转上述倾向方面显得更为老道,他们将个人情感寄寓于宏大背景下,如《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戈尔对父亲、儿子及姊妹的挚情,《海豚湾》里奥巴马对于海豚的真爱,《燃烧未来》的主人公对于家乡和家人的眷恋,都成为片中的点睛之处,从而将硬议题软化,使生态环境运动成为了一个蕴含情感的话题,消除了距离感,增强了亲近感,让生态环保真正成为一个人人有责的活动。

### 2. 非祈使性文本理念

所谓祈使性文本指在纪录片中使用命令式语气要求观者做什么以及怎样做。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令人生厌的叙事方式,不愿做他人思想的奴隶是人类的本性,因此祈使性文本的传播效果反而不如预期。

无论《难以忽视的真相》或者《海豚湾》及《燃烧未来》,片中所呈现的情景以及所提出的应对方式,都属于解释意义上的观点呈现,创作者的着重点放在提出问题并引领观众自己思考方面,有抛砖引玉之效,而无强加于人弊。这一点还体现在片子开放式的结局设计上。依照惯例,结局部分通常是纪录片拔高主题并托出应对方式的阶段,但上述三部纪录片,结尾处均未见此之类话语,其中《难以忽视的真相》和《海豚湾》仅仅借助字幕提出建议,态度恳切,容易为人所接受,故可排除命令之嫌疑。

### 3. 共通价值的审美指向

生态环保作为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取向,在传播方面难免受制于国家、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突破限制的最佳途径就是诉诸于共通价值以唤起更大范围的认同。既然自然之美与人性之善是最普遍的审美欲求,三部纪录片也就都致力于在此能有所建树。《海豚湾》中和谐的水下世界,《燃烧未来》里辽阔苍郁的西弗吉尼亚山脉,抑或是《难以忽视的真相》开头和结尾处宁静的暖风杨柳翠湖,都给观者留下了大自然本真美的一幕;另一方面,奥巴马与海豚之间超越种属界限的亲昵似的情愫,戈尔慈父的形象,以及西弗吉尼亚居民纯朴的田园牧歌生活,又可以召唤起人性中最原始的共通情感。这也正是三部纪录片能够超越文化的藩篱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的主要原因。

## 4. 导演兼解说并参与互动的叙述模式

《海豚湾》中,路易·西霍尤斯一人身兼三职,既是导演,又负责全片解说,还参与其中“现身说法”;他经常以声音介入画面,利用旁白引导观众,甚至走到镜头前,以平缓中立的神态进行讲述。《难以忽视的真相》一片里面戈尔也承担了类似的角色,不过相对而言主观色彩更为鲜明。上述参与手法在理论上可归属于比尔·尼克尔所谓的纪录片之“互动模式”,为美国纪录片人迈克尔·莫尔等所惯用,该手法既能通过构建在场效应以强化观众对内容的认同,还可以借助于导演视角引导观众达到对事件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 三

客观性与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衡量一部纪录片成功与否的最主要标准便是该纪录片能否做到客观真实地处理事件。

诚然,任何人都无法摆脱预设立场或既定框架。对于一部反映环保运动的纪录片来说,其落脚点永远都会放在生态正义理念的传达方面,制片人总是希望观众张开双眼敞开心扉,甚至与他们一起成为自然生态的卫士。这种情况下,客观性与真实性难免成为了相对的概念,也成为纪录片拍摄者必须要努力面对的问题。就三部纪录片的叙事手法而言,事情往往是,生态正义理念的畅快表达跟作品对于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追求之间,并非总是能对立统一起来,如《海豚湾》里面导演兼解说与出境的模式对纪录片的客观性就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 1. 单视点叙事对客观性的妨害

所谓客观是指不以特定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在纪录片创作中,客观性的直接体现便是拍摄者能从多个角度呈示事物,这是一种能祛除过多主观意识的创作态度。

如果从客观性维度来审视三部纪录片,可以发现《燃烧未来》对于客观性的建构是最着力的。在叙事方式上,《燃烧未来》一片竭力营造一种辩论的气氛,将镜头不偏不倚地对准争执中的双方,给双方同等的说话权利,力图通过多维视角还原问题的复杂面貌。

在《海豚湾》的拍摄过程中,导演也试图给反方以话语空间,比如影片的48分10秒处,路易·西霍尤斯采访了日本主管渔业的副部长;1小时05分45秒处,镜头对准了日本驻国际捕鲸委员会(IWV)的官员森下助二,当时他正代表日本政府阐明观点:“国际捕鲸委员会这样做是在扼杀像太地町这样以补鲸为业的沿海小镇”。但总体而言,与《燃烧未来》一片中反方所拥有的较充足的话语空间相比较,《海豚湾》多维视角的构建稍显不足。

《难以忽视的真相》无疑是创作者意识介入最为明显的一部纪录片,通片采用戈尔一人的视点,观众只能听到戈尔一人的声音,虽然论辩过程被展示得很详尽,但除戈尔本人外,再没有其他的信息及观点来源,造成观众对戈尔提供的信息和观点无法比较也无法辨别。据《外滩画报》报道,2007年9月,英国一名初级中学的校董就政府组织学生观看戈尔的环保纪录片提起诉讼,认为该片有很多地方与科学事实不符甚至相悖。法院的鉴定结果是,戈尔的纪录片中共有9处与科学事实相悖,并且推论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后来,英国高级法院裁定该片在作为资料片向中学生放映的时候,必须发放指导性的说明书,说明这9处地方存在误导。

总之,单一视点叙事虽然有利于论点的阐发,但这种“一面说理”的传播效果并不比“两面说理”更好,传播学的实证研究早已证明,“一面听理”的受众极有可能在听取了另一方的解释后倒向该方。纪录片中多维视角的缺失,使纪录片的公信力也就是客观性打了折扣。

## 2. 过度蒙太奇对真实性的影响

蒙太奇作为一种影像意义系统,为影视导演们所常用。在三部纪录片中,几乎可以找到蒙太奇的所有形式,它们不仅仅在配合叙事,某些情况下还单独表意,作者的态度观点则隐藏其间,“画”外之“意”也让影片拥有了更多的潜在内涵。然而“画外之意”毕竟是人为附加的东西,它们只是在创造逼真感,对片子的真实性却造成负面伤害。

相反,长镜头与运动镜头能反映事物在整一时空中不间断的变化,这对于以真实为生命的纪录片来说是异常重要的一种创作方法。比较而言,《海豚湾》在表现摄制组偷拍的过程中大量运用了长镜头;《燃烧未来》为了强调西弗吉尼亚山区采煤前后的风貌变化也大量使用航拍的运动全景镜头。而在《难以忽视的真相》当中,外景实地的长镜头几乎绝迹,而充盈其中的是突出式的表情特写,抽象的静态图表,以及割裂时空的蒙太奇对比,所有这些,只是经过戈尔讲解的串联才有意义,颇有爱森斯坦的理性蒙太奇的流韵。《难以忽视的真相》也因此成为一部在纪录片创作手法上争议颇大的作品。

## 四

纪录片与环保运动相结合,既拓展了纪录片的题材领域,丰富了纪实创造手法,又扩大了环保运动的影响,推动着生态议题更多进入公共讨论领域。然而在“双赢”的背后,仍然存在着如何平衡生态正义(环保纪录片之创作宗旨)与“程序正义”(纪录片之客观真实原则)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否则,再好的“正义”也会变成“宣传”,会影响到环保运动纪录片的社会效果的发挥,以及环保运动本身的社会公信力。2010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后“气候门”黑客爆料事件就曾置环保运动鼓吹者于尴尬的境地。此外,以严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而著称的纪录片人迈克尔·莫尔,其作品由于主题过于突出加之常常模糊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在美国学术界一般被归于“宣传”影片之列。

也许可以用雅各布·里斯的“事实的力量永远是最有力的杠杆”的观点,作为对于格里尔逊“锤子”论的平衡,使得处在现实与创造性处理这一古已有之的对立关系之下的纪录片环保题材作品,其风格的钟摆更多地向现实一端回归。

## 注释:

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张德魁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第84页。

Bill Nichols, Representing Realit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3.

《英国高级法院裁定:戈尔的环保纪录片有9处与科学事实不符》,《外滩画报》第265期,2007年12月27日。

Daniel Borden et al., Film: A World History, New York: Abrams, 2008, p.140.

阿瑟·罗思坦:《纪实摄影》,李文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浙江传媒学院)

(本文编辑:李宝萍)